



問題一：

在台灣的所謂國族主義，事實上是坐井觀天，甚至排擠別人，而當初年輕時代傾向自由主義的學者，現在也投入「台灣國族主義」的懷抱。而國人對國家的認同已經漸漸式微，是不是在現在這個時代裡，鄉土主義反而是比較興盛的？

問題二：

現在不論發表自由主義或國族主義，馬上會被扣上獨派或統派的帽子，可見台灣社會充滿著雙重標準，正確的社會價值需要趕快建立。而自由主義更遭到濫用，才會造成台灣目前的亂象。另一方面國族主義也脫離族群融合，成為霸道主義，真正要講求族群融合，是否不應該強迫弱勢族群融合到主流來？

問題三：

我的理解是「國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是兩相對立的」，請問西方會不會把這兩者交替應用，或是根本無法連結？目前自由主義的式微，是因為有「中國國族主義」和「台灣國族主義」的爭論，我們是不是可以有富含自由主義的國族主義表現？是否應該落實到社會與憲政層面，使之法制化？

黃光國答：

我們討論自由主義，知道人的權力應該用憲法來保障，這是非常重要的，可是我要強調，意識型態會隨著社會、情勢的變化而變化，那麼，在某種外力介入的情況下，即使你現在有憲法的保障，另一些人也會想辦法修憲。事實上，總統的權力非常大，相對而言便削弱了整個政府內部之間的制衡關係，而這樣的情況也會影響自由主義真正的精神。所以，許多事情我們應當用憲法來保障，可是不要忘掉，在很多客觀條件的影響下，你會因為某些特殊的因素，引發國族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，而危及自由主義的國家狀況。

還有一點我要談的是，有位先生說台灣的自由主義是「只要我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？」這點我是很反對的，這個絕對不是自由主義，這是亂七八糟主義。老實講，這樣的觀念是很糟糕、要不得的，可是我們卻把它當做是一個信仰、一個口號，這真不是社會之福。

邱義仁答：

黃教授提到中國國族主義和台灣民族主義的爭鬥，可能是台灣目前讓人憂心的原因之一，如果這兩個爭鬥可以緩下來，大概就會好一點；我也真的好希望是這樣，但歷史常常不如人意，因為這兩個國族主義爭鬥之後，帶來的可能是一種獨裁政權、法西斯政權，這就是自由主義必須要不斷戰鬥、絲毫不可鬆懈的事。即使是已經建立憲政體制的國家，隨時都可能會出現這樣的幽靈。我們可以看到歐洲跟澳洲，最近有些標榜國族主義的政黨浮現，而且取得一定程度的選舉勝利，我們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長期的問題，長期存在於這兩、三百年的人類歷史中，值得我們仔細分析。我要再強調的是，在這兩個主義之間做概念性的區分，並不足以了解這兩、三百年來，人類怎麼樣為了自由而鬥爭的慘烈歷史。

王杏慶答：

我想補充的是，最近這幾年西方人在談的，比較新、比較值得我們去思考的一種領土制度，可是這種制度不是以對抗敵人為前提。我覺得這種觀念非常新，對整個台灣、全世界而言，這種「沒有敵人的民主」有很大的啟發性，一改傳統以來我們常以敵人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民主制度概念。最近這幾年，美國發生了一個小小的論戰，因為以往我們談自由民主，都把自由民主連起來談，事實上不是的，戰後在很多主流國家，自由與民主的衝突性已經解決，自由是自由、民主是民主，它們是兩回事，所以也因此出現一些國家處於「不自由的民主」情境，台灣就是這樣。為什麼會出現不自由的民主？值得檢討。

另外，公民跟國民截然不同，西方語言學的資料顯示，公民是根據城市而來的，所以公民有一些絕對的價值標準，因此「價值的普遍性」應該是在談任何問題時，都必須去關心的重點；有些價值會隨著經濟發展而來，譬如物質、社會福利之類，可是人與人的尊重，這些比較抽象性的、對社會將是愈來愈重要的價值，就要透過人的努力才會得到，不會從天

上掉下來。自由主義基本上是可以述及權力、述及個人跟群體之間的理論，可是自由主義從來不是歷史、哲學，所以當它談到跟歷史有關的問題時，就要重新借別的理论來思考，而台灣的自由主義者真的應該好好去思考這個問題。

錢永祥答：

我提出五點觀察：第一，剛剛很多人在爭執的是對於台灣現實的判斷，我自己做了一個論斷，即是：台灣現在是國族主義取得了政治與道德的制高點，自由主義是在式微之中，或者也可以說在失敗、在退卻。不過我知道，在座有人對這個情況有不同的解讀，當然這是可以討論的，但至少到目前為止，我看起來就是這樣子。在台灣政治的領域，基本上分為兩個大黨或兩個半的黨，好像完全接受了國族主義的論述，像邱義仁先生也談到，民進黨其實原來有很強的自由主義傳統，然而在目前這個階段並不明顯，他們公開提出來的政綱，甚至發展方向、實際運作，顯示自由主義的聲浪是微弱的。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民進黨裡的個人不是自由主義者，在某些方面邱義仁先生比我更接近自由主義，不過針對政黨整體而言，自由主

義確實式微。

對於憲政體制以及民主程序的認同，是很基本的、自由主義式的公民認同，也就是要以此建立起對國家的認同，亦即是愛國主義；這個基礎並不表示對於國家的文化、傳統、土地、人民有什麼特別的感情，而是認同它的體制。在這方面，我覺得台灣經過幾次修憲，憲法在民間的神聖性已經完全喪失，這是我對於今天當政政權最不能夠原諒的事情。以前在蔣家統治時期，雖然對憲法做了很多破壞，但至少民間還有一個希望，希望有一天我們還要恢復到憲法去，有一天我們一定要實行憲政體制；現在台灣的老百姓沒有人相信這些，人人知道憲法是一個騙人的壞東西，每年可以修一次。我們說，美國憲法是一個民眾宗教，但是台灣的憲法絕對不可能變成台灣人民信仰的集中點，因此，台灣不可能藉由對憲政體制的認同而產生對國家的認同，這是這個政權造成的後果，換言之，自由主義在台灣不可能變成一股有效能的力量。

第三個問題是，在台灣的民族主義、或是國族主義，其實是中國的民族主義、或是中國

國族主義對台灣的民族主義、或是國族主義鬥爭的結果，我認同這個講法，也覺得這是事實；可是我想提出一個相對的看法，就是如果沿著國族主義的路線走，那麼兩岸的關係是不可能解決的。邱先生提到，若依此方向前行，到最後會變成兩個政權對內的集中性，甚至連控制性都會愈來愈強。另外，王先生的意思大概也是問「民主制度有沒有辦法不以假設敵人為前提？」今天兩岸的關係，若是再用民族主義的路線來思考，肯定會走進死胡同，台灣如此，北京也一樣。

第四個問題是邱先生提出來的，他覺得公民權必須要落實在國民的身上，這個我並不完全否定，可是王杏慶先生就提到，公民是多過（more than）國民的，我覺得我能接受他的想法。公民一定超過國民，而今天台灣要走向一個理想的公民社會，就必然要能夠對這個「國」做批評、檢討，甚至是拒絕。德國人在希特勒時代，沒有一個公民社會起身對抗，所以德國走上那樣的一條路；今天台灣不用把自已想得太大，不用以為我們非得要把歷史上所有的路都走完，不過自由主義的經驗，我想還是值得提出來供社會參考。

也許我對台灣社會實行自由主義的評價太過於負面，我接受批評。不過還要講的一句話就是關於「後現代」這個字眼，王杏慶先生雖然很不以為然，可是我認為後現代跟自由主義確有關係，但它們不是水乳交融那樣子……只可惜這個問題超出了我們的話題，所以暫時不在這邊談。